

傅振伦与方志批评*

薛艳伟

提 要：傅振伦是20世纪中国方志学研究大家，一生致力于方志编纂和方志学研究，方志批评是其重点着力的研究方向，造诣颇深，成就卓著。傅振伦善于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方志批评，并有诸多关于方志批评的标准。傅振伦方志批评的特点体现为敢于批评名家名志、提倡经世致用、勇于自我批评。傅振伦作为方志批评大家，对中国现代方志批评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傅振伦 方志批评 形式 标准 特点

傅振伦（1906—1999年），字维本，河北省新河县人，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傅振伦在方志学、史学史、目录学、档案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简牍学、陶瓷史、科技史、民俗学等许多学科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并且是其中诸多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傅振伦一生的学术历程基本与20世纪相始终，考古学者俞伟超称赞傅振伦是“我国近代人文科学发展的同龄人”^①。方志学是傅振伦所有研究领域中成果最为丰硕且影响最大的学科，素来为学界所推重。傅振伦是中国方志学研究大家，在中国方志学界有很大影响。

方志批评，又可称为方志评论，主要是指对方志论著、新旧志书的优劣得失、成就与不足等进行评价和议论。方志学者董一博大力倡导开展方志评论，并对此有精彩的论述：“一个时代的名志佳本或是简陋之作，固应首推编纂者，但是，尤赖评论家的慧眼妙笔，评其得失，论其正误，对是非、真伪及臧否等问题，可质言而证，进一步对志观、志材、志法等得以述其究竟，将方志工作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进一步指出方志评论的作用说：“方志评论，不仅仅具有起生开路，纠谬补阙，扶正培本的功能，而且能积极热情地为旧志整理和新方志编纂服务。它既能对旧志进行正确分析批判，又能大胆勇敢谨慎清醒地继承其珍贵之处，而对新志则能克尽扶持，明是非，定真伪，别臧否，体用建设，示人以康庄大道。”^②可见，方志评论对于方志编纂和方志学发展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郑正西和周永光编辑的《新编地方志点评》一书是对新中国第一轮修志时所修新志进行点评文章的汇集。傅振伦在为该书作序时指出其作用说：“本书根据‘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对新志作了客观的分析，品鹭其利病得失，褒贬交施，探讨了修志方针和修志规律，集中了各地60多位学者、教授和新志编纂者的心得体会于一书，见仁见智虽未必尽当，但对于今后方志的创新，确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新志编纂学来说，无疑也是一个贡献。”^③傅振伦认为，方志批评有利于总结方志编纂经验和探讨修志规律，能够推动方志编纂学的发展。值得指出的

* 本文为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明宪宗实录〉整理校勘及启示研究》”（项目编号：2020YJ169）成果之一。

① 俞伟超：《序言》，傅振伦著：《文博叢残》，中国历史博物馆，1996年，第1页。

② 参见董一博：《开展方志评论 提高修志水平》，《董一博方志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13页。

③ 傅振伦：《序言》，郑正西、周永光编：《新编地方志点评》，黄山书社，1988年。

是,傅振伦本人也是方志批评大家,对中国现代方志批评学的建立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学界关于傅振伦在方志评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仅有林衍经《略论傅振伦先生方志评论的特点》一文,该文指出傅振伦方志评论有4个特点:第一,评论方志时要兼顾方志的优劣得失;第二,实事求是,不因人废志;第三,独立思考,不迷信名志,不盲从权威;第四,善于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作者各举一例加以说明,称赞傅振伦具有坦荡的胸怀和崇高的品德。^①遗憾的是,此文仅局限于对傅振伦方志评论的特点进行初步总结,而且篇幅短小,对于其在方志批评方面的诸多面相,如关于方志批评的形式和标准则概未涉及。故笔者拟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以深化学界对傅振伦在方志批评方面成就的认识和研究。

一 方志批评的形式

傅振伦本人非常重视方志批评,他采取多种形式来进行方志批评。所谓方志批评形式,是指以何种文字表述形式来表达方志批评。通览傅振伦的方志批评,主要有如下7种形式:

第一,序跋。序跋是方志批评最为传统的形式,如章学诚《书〈灵寿县志〉后》是评论清初陆陇其所撰《灵寿县志》的文章。^②同样,傅振伦一生撰写了大量方志序跋^③,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第一轮修志活动轰轰烈烈的进程中,傅振伦应邀为近百部新修方志写作序跋。这些数量庞大的序跋是其方志批评的重要形式。

第二,志评。所谓志评,就是给方志所写的书评。对于志评的作用,傅振伦在给张景孔《志评》一书作序时说,虽然当今修志的风气日益高涨,但是“惟品鹭讨论之风不盛,似不易收到相互研讨以收提高质量之效,世或引为憾事”。《志评》为张景孔所写志评的合集,傅振伦对该书寄予深切厚望。他指出:“此书出必能启评志之风,且得评志之道,于提高修志水平或不无裨益。”^④可见,傅振伦认为志评对于修志事业非常重要,应当大力倡导写作志评。在这种理念驱使下,傅振伦撰写了不少志评。如《喜读中华版〈宋元方志丛刊〉》是为中华书局出版的《宋元方志丛刊》所写的书评^⑤;《继往开来有裨实用的一部新志——〈浙江名镇志〉》是为上海书店出版的《浙江名镇志》所写的书评。^⑥此外,傅振伦为单部方志所作书评更是不胜枚举,如《一部突出商丘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新志书》^⑦、《〈宿迁市志〉述评》^⑧、《体例新颖的〈龙游县志〉》^⑨、《评〈青田县志〉》^⑩等。

第三,专著。除了在单篇志评进行方志批评外,傅振伦的几部方志学专著中蕴藏的方志批评也是俯拾即是,如金珠碎玉散落在书中随处可见。如傅振伦在《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中评论

① 参见林衍经:《略论傅振伦先生方志评论的特点》,《广西地方志》2001年第1期。

② 参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六《书〈灵寿县志〉后》,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73—1075页。

③ 参见薛艳伟:《傅振伦和方志序跋》,《中国地方志》2019年第3期。

④ 傅振伦:《序言》,张景孔著:《志评》,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页。

⑤ 参见傅振伦:《喜读中华版〈宋元方志丛刊〉》,《书品》1991年第2期。

⑥ 参见傅振伦:《继往开来有裨实用的一部新志——〈浙江名镇志〉》,《浙江方志》1992年第2期。

⑦ 参见傅振伦:《一部突出商丘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新志书》,《中国地方志》1992年第3期。

⑧ 参见傅振伦:《〈宿迁市志〉述评》,《江苏地方志》1997年第3期。

⑨ 参见傅振伦:《体例新颖的〈龙游县志〉》,《浙江方志》1992年第3期。

⑩ 参见傅振伦:《评〈青田县志〉》,陈慕榕等编:《〈青田县志〉评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大明一统志》：“是书详纪风俗政事，备考沿革，纲举目张，亦有可观。”^① 他批评戴震的方志观念过于守旧：“大儒如戴东原，修志犹过重地理沿革与古迹，总未脱图经观念。”^② 他批评明代方志说：“志家本有尚简尚繁二体也。明世方志，颇病芜杂。康海撰《武功县志》，韩邦靖撰《朝邑县志》，矫正前失，力求简古……夫记事之道，贵于能简而明，畅晦而曲达。若康、韩之简而无当，潜滥荒疏，则谬矣。”^③ 在《中国方志学》一书中，他批评清代方志存在3种通病，分别为不得体要，无裨实用；广征文献，猥烦不节；宣扬亲厚伪迹，妄希名垂千古。^④ 傅振伦这里表达的观点，都是一些重要的方志批评见解。

第四，论文。傅振伦作为著名方志学家，一生写过数百篇方志学方面的论文，不时在论文中涉及对方志的批评。如在《论方志的起源和演变》中评论《元和郡县志》云：“信而有据，详略得中，记叙有法，实为有用之书。”^⑤ 再如，傅振伦在《中国地方志的发展与前瞻》中指出宋人王象之所撰《舆地纪胜》“体例谨严，考证赅洽”，评论高似孙所撰《剡录》“叙述有体，简要古雅，不愧杰作”^⑥。如此之类，不胜枚举。

第五，书信。在第一轮修志活动中，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志办公室的编纂者请求傅振伦审订志稿，傅振伦在认真审阅后，都会及时去信回复，写出他的审稿意见。他自称：“我经常接到各地编史修志同志们的来函，商榷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有时还受托审阅文稿，已经分别答复。”^⑦ 如《应山县志·后记》云：“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多次审阅我们的篇目和志稿，经常写信指教，还通审了县志总纂稿，逐卷批改，提出许多修改意见。”^⑧ 《大城县交通志·后记》云：“中国方志学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老先生来信指导志书篇目的修订。”^⑨ 《赣县志》附录的《修志始末》说：“请省内外专家、学者评审。将志稿寄给担任本志顾问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先生全面审查、指教。”^⑩ 傅振伦的这些复信中，包含不少对新志优劣得失进行点评的内容。如在给《京山县志》编纂办公室的一封信中评论该志说：“广询博采，仿纪传之体，为大事记一卷，专志、人物卅一编，间以图表，首照片、概述，附录断后。全县自然和人文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粲然备于一书。叙事简明，深得荀悦《申鉴》之义，有裨经世与教化，堪称杰作。”^⑪ 再如，傅振伦在给《通江银耳志》编委会的复信中评论该志说：“这部书系统地记述贵县名产的历史和现状，附有关文献、人物碑记、大事记，内容完善，实是修志的重要材料。于开发经济也大有帮助。”^⑫ 由此可见，书信也是傅振伦进行方志批评的

①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②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第26页。

③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第31—32页。

④ 参见傅振伦：《中国方志学》，《傅振伦方志论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⑤ 傅振伦：《论方志的起源和演变》，《浙江学刊》1986年第1—2期。

⑥ 傅振伦：《中国方志的发展与前瞻》，《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⑦ 傅振伦：《〈五台新志〉读后》，《山西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5期。

⑧ 湖北省应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应山县志·后记》，《应山县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723页。

⑨ 大城县交通志编写组：《大城县交通志·后记》，《大城县交通志》，廊坊地区行政公署交通局出版，1987年，第256页。

⑩ 江西省赣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赣县志·修志始末》，《赣县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第733页。

⑪ 傅振伦：《论〈京山县志〉书简一束》，《史志文萃》1991年第2期。

⑫ 傅振伦：《〈通江银耳志〉评析》，李秀国主编：《志局内外》，通江县新华彩印中心，2001年，第23页。

重要形式。如果有人将分散各处的有关傅振伦与全国各地地方志编纂者以及学者谈论方志的书信汇集为一编，对于方志学界将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事，对于我们了解傅振伦的方志学思想也是大有裨益的。

第六，札记。傅振伦在审阅新志时，往往将一些平时积累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写成札记，供自己写作论文时参考。《傅振伦文录类选》所收《志稿审读随感录》和《审读新编方志及专志札记》2文，就是他所写部分方志札记的汇编。傅振伦在这些札记中，表达过不少方志批评思想。如在《审读新编方志及专志札记》中表示反对刊印新志时因追逐形式和美观而劳民伤财。他主张新志的封面要朴素大方，节约办事。再如，他指出综合性方志和专业志之间的关系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培养人才、开发智力主要阵地，为立国之本。各地区或市县多编科技或教育志、水利、交通亦有专志，今市县编纂这类编章，可用剪裁之法，互见详略。惟性质虽近，而体裁不同，不可照抄照搬专志之文。”傅振伦认为编纂综合性方志时可以借鉴和参考专业志的内容，但是不能完全抄袭专业志的文字，二者可以互见详略。又如，有的新志编纂者为便于读者检索，将方志中涉及的朝代、地名、人物、事件、术语等专门名词编制成索引附于书尾；还有的编制关于人物、表谱、经济方面的索引。傅振伦反对事无巨细、不加区分的编写索引，他说：“我以为索引不必求备，过于烦碎，当以有裨于实用者为主。”^①他主张索引的目的是追求实用。所以，札记也是傅振伦进行方志批评的重要形式。

第七，提要。所谓提要，即书目提要式目录著作中对所著录方志所撰写的解题，也是一种传统的方志批评形式。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地理类著录有417种方志，主要为宋、元、明三代所修旧志。每篇提要的基本内容包括方志的撰修者、体例、内容、门目分合，并评论其得失。瞿宣颖的《方志考稿（甲集）》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地方志目录提要，1930年由天春书社刊行。该书提要对所著录的方志和其编纂者多有精到之语。傅振伦本人对方志提要非常重视，他早年参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地理类方志提要 and 《故宫方志书目提要》的写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写有《河北明刊方志提要》^②。傅振伦一生总计写作有200余篇方志提要。因而，方志提要成为傅振伦表达方志批评思想的重要形式。

从上可见，傅振伦进行方志批评主要有序跋、志评、专著、论文、书信、札记、提要等多种形式，可谓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傅振伦的各种方志著作形式中都蕴含着大量方志批评，不少深刻的方志学思想是通过方志批评来表达的。对于我们后人研究傅振伦来说，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资料，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研究。

二 方志批评的标准

历来方志学家在进行方志批评时，各行其是，并没有一致的评论标准。同样一部志书，因批评标准的差异而评论不一。综观傅振伦的方志批评，有如下7个方面的评价标准：

第一，体例是否完善。傅振伦非常重视方志的体例问题，他说：“修志之道，先严体例，义不先立，例无由起。”^③又说：“为学之要，首定体例。”^④傅振伦在评论一部方志时，首先看其

① 傅振伦：《审读新编方志及专志札记》，《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263—269页。

② 参见傅振伦：《河北明刊方志提要》，《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③ 傅振伦：《与王重民二次致瞿宣颖函》，《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147页。

④ 傅振伦：《新编地方志质量问题刍议》，《中国地方志》1989年第4期。

体例是否完善。如傅振伦认为《临安县志》在体例上效仿《史记》一书：“仿本纪而为大事记述，仿八书以述政区、自然、经济、文化、社会。仿列传以叙列人物，并冠以图说详今溯古，本末兼备，不愧‘一方之全史’。体例完善，史实详备。”^①再如，傅振伦评价《巴林左旗志》在体例和篇目设置方面的创新之处说：“新志创成，篇目编次颇有新意。以资源、设施、产业为序志述经济，利于综合比较，符合时代要求。首列经济总体，次及各行各业，巨而及细，宏微相济。此等结构章法，一扫部门栏界，逻辑关系了然，与他书迥别。民族志征考部落源流，方言志详载蒙古土语，亦属出新之举。仿章学诚‘前志列传’之义而作史志专章，记述有法。人物以侨居外域之旗民列为‘乡友录’，立义亦佳。”^②又如，他指出《淳安县志》的第一个优点是体例完备，认为该志“记事沿用史书综合的纪传体，辅以图表，并首列概述，提要钩玄，总括全书；次列大事纪通贯古今重要史事；专志分类详述地方自然和社会体相，以及人物、献征。其详俗略政、详独略同、详今略古，推陈例以启新格，颇具史识。”并举例说明其中的两处体例优点：一是旧志惯例，记录长寿老人多限于80岁以上，该志则只记录百岁以上老人，且叙述他们的养生之道，傅振伦认为这样的安排“有实用而合时宜”。二是该志专门设立《文献编》，这与傅振伦素来提倡设立文献志的说法不谋而合。^③可见，方志体例是否完善是傅振伦评价志书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

第二，内容是否全面。傅振伦非常认同方志是“博物之书”和“一方之全史”的说法，他强调修志要追求“内容周备”，认为“方志上自天气气象，下及地理，中括人事，古往今来的事象，是包罗万有，无论文征、掌故、丛谈，凡是关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以及科学实验者，都应载在方志。固不可偏而不全，或有所遗漏”^④。傅振伦对记载内容详备的方志赞赏有加，称赞《临安县志》内容完备说“凡关临安史事、掌故，必多方访求，详今略古，笔之于书。历代兵事，如山越抗争、农民战迹、辛亥革命等事，近世国人抵抗外来侵略，及红军、新四军活动、解放战争史实，乃至社会主义建设，一无所遗，备载于志”^⑤。再如他称赞《金县志》的一个特点是“记事翔实”，说该志“述往事，诏来者。既叙述了先民辟疆拓宇、缔造灿烂文明之伟绩，又备载了强邻欺凌的原委旧事和人民饱经的忧患酸辛”^⑥。

第三，是否具有特色。傅振伦认为每部方志都要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反对千篇一律。如《宿迁市志》将本市特色产业玻璃工业、能源工业、建筑业、粮油经营、环境保护等都单独设为一编。傅振伦认为这是该志的一大优点，突出了地方特色。^⑦再如，傅振伦评价民国《冀县志》特色说：“最可贵者，记事必详制度之沿革，更多列表，以驭繁赜之文，皆为得体。如汉唐以来，以迄近世等水患表明晰表达了历代水灾实况。《明清职官表》、赋役表，并皆简而明，且节约了篇幅。《小学表》、《职员表》、《列女表》亦然。”^⑧额尔古纳右旗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

① 傅振伦：《临安县志·序言》，临安县志编纂委员会：《临安县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年，第2页。

② 傅振伦：《〈巴林左旗志〉序》，《傅振伦文录类选》，第319—320页。

③ 参见傅振伦：《书〈淳安县志〉后》，淳安县志编辑室编：《淳安县志评论集》，淳安印刷厂印刷，1991年。

④ 傅振伦：《新编地方志质量问题刍议》，《中国地方志》1989年第4期。

⑤ 傅振伦：《临安县志·序言》，临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临安县志》，第2—3页。

⑥ 傅振伦：《金县志·序言》，大连市金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金县志》，大连出版社，1989年，第3页。

⑦ 参见傅振伦：《〈宿迁市志〉述评》，《江苏地方志》1997年第3期。

⑧ 傅振伦：《民国〈冀县志〉书后》，《傅振伦文录类选》，第295页。

傅振伦在《〈额尔古纳右旗志〉序》称赞该志富于地方特色，特别突出了其民族特点：“《城乡建设》卷详细叙述了北方严寒地区的民俗特点及具体防寒措施；《军事》卷详记清代卡伦的设置及其功用，热情讴歌了各族同胞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爱国情操。《民族》卷记述了绚丽多彩的边疆民族风情。又依据边疆特点专立《外事》一卷。”^①与此类似，傅振伦指出《巴林左旗志》的一大优点是该志突出民族特点，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他说该志：“记述蒙医、蒙药，兼及鼠疫、地方病等，又选录秘方、验方，乡土资料至为丰实。志述地方体育，注重民间，蒙汉并举，特色显著。有农牧民、职工、老人等体育，又兼及学校与竞技体育，无一遗略，非同一般。采集蒙古族谚语，分类汇录，尤有特殊之塞外意义。所述喇嘛教、萨满教均为研究北方民族文化不可缺者。”该志详异略同，傅振伦认为这是其特点突出之处。总之，《巴林左旗志》是一部“地方特色显著的佳志”^②。地方性是方志的一个重要特征，从上可见傅振伦对能体现出地方特色的方志赞赏有加。

第四，是否有用。傅振伦是一位提倡治学要经世致用的学者，他认为编纂方志要突出实用性，即“新志的编纂，贵在实用”^③。傅振伦非常赞同章学诚对方志功用的定位：“修志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④新志是否有用，成为他进行方志批评时的重要指标。傅振伦评价《宿迁市志》“不愧是一部有用的佳志”^⑤。他评论《咸丰县志》：“网罗一邑文献、资料、数据，博且翔实，足以存史、资政、教化，实为有用的佳志。”^⑥傅振伦评价《翁牛特旗志》的作用说：“这部志乘实具有贮存资料、经世资治、恢弘文化、垂示方来等社会效益，对翁牛特旗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必将产生积极的巨大作用！”^⑦他说《淳安县志》“淳安新志对于存史、辅治、教化，实具有重要作用”^⑧。评判《浙江名镇志》的作用说：“不仅可备征文考献、编纂史志之资，且可教育后人，增强爱国爱乡之情。尤可贵的是为当代两个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信息和科学依据。诚为切实有用之书。”^⑨

第五，资料是否翔实。傅振伦称赞《翁牛特旗志》资料丰富，进而叙述该志的编纂者苦苦搜集资料之过程道：“1981年，翁牛特旗响应中央撰史修志号召，首先搜集史料，四年之间涉足图书馆、档案馆，翻阅有关史籍、档案、专著，采集了文献资料，更访问了参与革命的当事人、知情人，又得到了第一手资料，编印了革命回忆录《紫城风云》。还考察了有关考古资料，考订编次，历时四年，始成志稿32卷。”^⑩再如，傅振伦指出《淳安县志》的第三个优点是“富于资料性”，修志者在编辑之初，即多方稽考古籍、档案、谱牒、文集、史迹文物、口碑传说，以及现代资料和统计数据。其中《文献编》收录有文告、奏议、碑记、书简、序跋、文粹、碑刻

① 傅振伦：《〈额尔古纳右旗志〉序》，《傅振伦文录类选》，第314页。

② 傅振伦：《〈巴林左旗志〉序》，《傅振伦文录类选》，第320页。

③ 傅振伦：《新中国的地方志编纂体法议》，《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307页。

④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第885页。

⑤ 傅振伦：《〈宿迁市志〉述评》，《江苏地方志》1997年第3期。

⑥ 傅振伦：《〈咸丰县志〉〈应山县志〉读后》，姜大平编辑：《新县志论辑》，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15—16页。

⑦ 见傅振伦：《翁牛特旗志·序言》，翁牛特旗志编纂委员会编：《翁牛特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⑧ 傅振伦：《书〈淳安县志〉后》，淳安县志编辑室编：《淳安县志评论集》，第30页。

⑨ 傅振伦：《继往开来有裨实用的一部新志——〈浙江名镇志〉》，《浙江方志》1992年第2期。

⑩ 傅振伦：《翁牛特旗志·序言》，翁牛特旗志编纂委员会编：《翁牛特旗志》，第2页。

墨迹、诗词。文告中选录名宦海瑞《政事录》中的重要文征；《附录》中有历代修志纪略、旧志序跋等文献。傅振伦认为这些史料，“可以考古验今”^①。又如，傅振伦赞扬《扬州市志》在资料方面的优点：“全志史料翔实，多采自旧志、正史、文集、档案、金石及口碑资料，如‘洪武赶散’与‘移民吴堡’等传说，广泛流行民间，与明初北方洪洞移民同为当时社会大事，新志亦据访问资料而记注之，体现了志以补史之特点。”^②

第六，文字表述是否得当。傅振伦认为，方志的文字表述崇尚简要，他说：“编史修志宜以简要为主，不要求量多，而要求质高。不要冗长拉杂，扰人心目。”^③傅振伦评价《额尔古纳右旗志》曰：“文字简练，通俗易懂，且便于传诵普及，诚为可贵！”^④他在《〈庆云县志〉序》中说：“记事要详备，要繁省得中，而文字必须简要，文省事备，不可以多为胜。”^⑤傅振伦在《〈上海公路运输志〉序》指出某些方志在文字表述方面的失误，“尝闻西人大学传统课程，必有逻辑学与修辞学。我国先哲亦以文、义、理并重，遣词造句，一再推敲，期于信、达、雅而合理……今观此《上海公路运输志》行文规范，务实存真，文字严谨，朴实易晓，独无上述之失，堪称新志典范”^⑥。

第七，是否具有科学性。傅振伦认为“新修方志要求具有高度科学性，不仅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还要有科学性的内容”。如傅振伦称赞《临安县志》在篇目设计和编纂方法上具有科学合理性：“今观全书多有信实的统计数据，有彩色及黑白照片的清晰的具体形象，有用科学方法制作的等高线地形图。”^⑦再如，傅振伦指出《淳安县志》的第四个优点是“富于科学性”。具体来说，该志“访求的资料，通过调查考察，加以核实。实事求是，据事直书，故史料翔实，允称信史。地质、地貌、方言等篇章，作于专家之手，亦确切允当。姓氏篇则据家藏谱牒，记其迁徙历史与派生源流，更叙其分布现状，可以为团结人民协作生产之一助。其树木名录、古树名木录、新安江水库鱼类名录，或附其学名，或记录其现状，有裨科学研究”^⑧。可见，科学性是傅振伦方志批评的重要标准。

以上是傅振伦进行方志批评的几个主要评论标准。更多时候，傅振伦不是依次列举一部方志的诸多特点，而是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如他评论《淳安县志》说：“观点正确、体例完善、资料翔实、科学性强、文风端正、言词平易。详今略古，突出当代，既具有显明的社会主义时代特点，且有地方特征。”^⑨又如他评价《偃师县志》说：“体列（当为‘例’）完善，史料翔实，行文简要，诚乃佳作，为储存文献史资、科学研究，尤其是为地方党政领导两个文明建设的决策，提供信息及依据，实有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⑩再如，傅振伦评论《通江县城建设志》

① 傅振伦：《书〈淳安县志〉后》，淳安县志编辑室编：《淳安县志评论集》，第29页。

② 傅振伦：《扬州市志·序言》，扬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扬州市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3页。

③ 傅振伦：《史志叙事尚简说》，《中国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4期。

④ 傅振伦：《〈额尔古纳右旗志〉序》，《傅振伦文录类选》，第313—314页。

⑤ 傅振伦：《〈庆云县志〉序》，《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

⑥ 傅振伦：《〈上海公路运输志〉序》，《傅振伦文录类选》，第366页。

⑦ 傅振伦：《临安县志·序言》，临安县志编纂委员会：《临安县志》，第3页。

⑧ 傅振伦：《书〈淳安县志〉后》，淳安县志编辑室编：《淳安县志评论集》，第29页。

⑨ 傅振伦：《书〈淳安县志〉后》，淳安县志编辑室编：《淳安县志评论集》，第27页。

⑩ 傅振伦：《书〈偃师县志〉后》，孙占奎主编：《偃师县志评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7页。

云：“其指导思想正确，体例完善，篇目设置井然，资料翔实，叙事严谨，文笔朴实，可谓得修志之道矣。”^①又如，他评论《西平县志》云：“体例完善、观点正确、方法科学合理、史料翔实、文字通畅。”^②兹不列举。傅振伦认为，新时期中国方志的发展大方向应该是提高方志质量，而“高质量的方志应做到观点正确、体例完整、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文字畅达。既具有科学性，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③。以上傅振伦在进行方志批评所坚持的评论标准，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服务于新中国第一轮修志实践活动，争取全国各地新修志书质量进一步提高，不断出现更多高水平、高质量的方志。

三 方志批评的特点

全面考察傅振伦的方志批评成果，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方志批评具有如下一些重要的特点：

第一，坚持独立思考，敢于批评名家名志。如《深州风土记》是晚清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所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名家所撰名志。《河北省方志概要》评价《深州风土记》云：“此书考证详博，载事分明，文词精美，在清末众多志书中，堪为佳作。”^④傅振伦在《深州风土记论略》一文中批评该志说：

此志斤斤于文词，牺牲志实不知凡几，以文人而修志无史才也……考征不精，详古略今，大违志体，无史学也。据摭前载，自以为甚详，而采录近事，则甚草率（见该书后序诸文）。有书无图，阅者茫然。自谓书名“风土记”不可无物产，而不知既名风土记，更不可不有其他详纪社会状况诸篇。众手编成之书不入艺文，物产而列风俗、乡社，建置而入疆域，书无目次，又少标题，竟无条目之可寻。不善学者，必感淆并。凡此者无识也。^⑤

傅振伦批评吴汝纶缺乏史才、史学、史识。反映他不迷信于权威学者，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再如，黄炎培所纂《川沙县志》和黎锦熙编纂的《城固县志》《洛川县志》二志在大事年表中都列举了同一时期发生的国内外大事，形成中外大事对照表。黎锦熙列举的国外大事，诸如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马其顿和罗马始兴、穆罕默德的出生、罗马帝国分立、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路易十四即位、华盛顿出生、美国南北内战等。傅振伦认为这些世界大事和一个偏远小县，并没有直接联系，“似是滥载”^⑥。因此，这样“以国内外大事列表对照，近乎画蛇添足”^⑦。《洛川县志·教育志》照例载录政府案牍和官场讲演词等文章，傅振伦认为这是繁复无用的。黎锦熙的《方志今议》是民国方志学名著，傅振伦指出，该书虽然“议论得头头是道”，

① 傅振伦：《通江县城建设志·序言》，蹇学信主编：《通江县城建设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

② 傅振伦：《当代修志的成就和展望——从新编〈西平县志〉说起》，《中国地方志》1991年第2期。

③ 傅振伦：《傅振伦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8页。

④ 于洪儒主编：《河北省方志概要》，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8年，第109页。

⑤ 傅振伦：《深州风土记论略》，《傅振伦方志文存》，黄山书社，1988年，第14—15页。

⑥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71页。

⑦ 傅振伦：《大事纪的编撰》，《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407—408页。

但是，黎锦熙本人在具体修志过程中多难以贯彻实行其主张。^①

又如，民国《龙游县志》是余绍宋所修。梁启超为该志作序说，余氏的方志学思想虽然受到章学诚的影响，但是他的史识和史才要超过章学诚。梁启超说《龙游县志》有 10 长，如称赞该志“构造之美，寓文理密察于洁净精微中”，又称其征引繁复，“为搜集史料、辨证史料最好模范”，并称誉《龙游县志》为“我国方志学中独传之作”，评价可谓高矣。^②梁启超具有崇高的学术威望，由于他的热捧，《龙游县志》历来被称为名志。梁启超虽然是傅振伦尊敬的学界前辈，但他并不苟同梁氏的说法，认为梁启超的序言“实属妄誉溢美之词”。傅振伦认为《龙游县志》存在 6 处缺点：详古略今、草率从事、不事调查、言行不一、歧视兄弟民族观念、宣传旧礼教。特别是最后两点，“荒谬之至”，“尤为悖理”，批评可谓严厉矣。傅振伦认为《龙游县志》“仅可说是一邑文献的私家杂记，既未实地调查，不合现实，谈不上有裨实用的地方志书。虽然梁启超的荒谬宣传，并不能抬高其学术价值”^③。

傅振伦所批评的吴汝纶、黄炎培、黎锦熙、梁启超、余绍宋等，都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深州风土记》《城固县志》《川沙县志》《龙游县志》等，也素来被方志学界称许为晚清民国时期名志。傅振伦敢于批评这些名家名志，体现了他不盲从权威、坚持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

对于方志的优点，傅振伦从来不吝赞赏之词；对于方志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他也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如傅振伦对《西平县志》甚为称许，认为该志是“国内新志的翘楚，在当今佳志中颇有代表性”。他也指出该志的不足：“惟全书记事，政治部分稍感薄弱，大事记过于简略，抗日战争事迹亦嫌分散。往昔惬意，当代新风，也当叙述，以昭法戒。近日新志多记百岁以上老人事迹及其长寿之道，今付阙如。解放后大事记年代可用黑体字印刷，较为醒目。还可编制索引于书后。这都是美中不足之处。”^④

再如，有的修志者为了突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在党团志中往往将共产党列于国民党之前。傅振伦认为：“爱国爱党，不在此也！”他指出国民党的成立要早于共产党，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因而，他主张修志者应该尊重历史，首先叙述国民党，纠正以往这种习以为常的做法。^⑤又如，傅振伦认为《石城县志》虽有不少优点，但是“金无全赤，世少无瑕白璧，是书也不免一些缺点，如个别部分记事不探其源，沿革不详，脉络欠明。专志颇觉简略，不无遗憾。《志存》文件摘录尚可收入《共产儿童课本》原文”^⑥。

第二，敢于批评不切实际的不良学风，提倡经世致用的精神。经世致用是傅振伦读书治学一以贯之的根本宗旨和基本精神。他在晚年回顾自己一生的治学经历说：“多年来，我本着学以致用的宗旨，认真钻研史学。”^⑦傅振伦认为修志是为了实用，“志乘之撰，宜博考详载，以重实用”^⑧。傅振伦批评当代一些方志学研究者治学不切实际的情形说：“史志所以征文考献，鉴古

① 参见傅振伦：《中国方志学》，《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 71 页。

② 参见梁启超：《余越园龙游县志序》，《晨报·副刊》1925 年 12 月 14 日。

③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 66—67 页。

④ 傅振伦：《当代修志的成就和展望——从新编〈西平县志〉说起》，《中国地方志》1991 年第 2 期。

⑤ 参见傅振伦：《〈宿迁市志〉述评》，《江苏地方志》1997 年第 3 期。

⑥ 傅振伦：《书〈石城县志〉后》，《中国地方志》1991 年第 1 期。

⑦ 傅振伦：《傅振伦学述》，第 38 页。

⑧ 傅振伦：《编辑北平志蠡测》，《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 118 页。

识今……窃见今之治史学者，有的竟尚虚无玄妙之词，不重实际，既不关社会效益，徒瞽人心目，殃及梨枣。”^①正是本着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傅振伦在评论方志著作时，特别强调方志的经世致用性。如他评价《中国地方志集成》云：“这部通时达变、富有实用价值的宝典，必将对建设和学术研究，起到显著的效益！”^②他评论《唐山市科学技术志》云：“其内容广泛而全面，古今备述，更突出现代，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翔实的依据。既宣传了人民建设的业绩，又实事求是，据事直书，善恶必录。对于当地环境的污染、地下水的枯竭、林木时遭乱砍滥伐，也直言无忌，不曲笔隐讳，以佐为政参考。这都是本书优点所在，也合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精神。”傅振伦称赞《唐山市科学技术志》是一部佳构杰作，也是一部经世致用的良志。^③他评价《新河县水利志》为“有裨实用”，且“不愧为一部富于资治参考价值的政书”^④。他称赞《榆次市志》的作用说：“略古详今，故可收经世致用之效。改革开放也好，推动生产也好，开展旅游事业也好，都不能离开此书。”^⑤他称赞新编《扬州市志》说：“能成为资治有用之书。对于建设新扬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定能起到推动作用。”^⑥傅振伦认为：“方志史料广博，有经世致用、广储文献和兴振教化等作用，遂大为世重。”^⑦又说：“方志的功能贵在经世致用，辅政资治，并有益于教化。”^⑧可见，修志要体现出方志的经世致用性，要使方志学成为有用之学，是傅振伦毕生始终反复提倡的理念和坚持的治学目标。

第三，敢于承认自己以往的不足，勇于自我批评。民国《新河县志》为傅振伦主编，这也是他一生中惟一编纂完成的方志。傅振伦晚年对早期的这部方志进行反思，他在《中国方志学》一书中指出，该志存在不少缺点。如《新河县志》设立选举与教育门，傅振伦认为科举与教育并非一事，将科举与教育合为一志是不当的。又如，该志方技传后附以灵异，傅振伦认为过于迷信。此外，全志除卷首《新志述略》外，其他部分没有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使读者阅读不便。^⑨傅振伦承认，这些都是该志显著的缺点。后来傅振伦在《我研究地方志的经过和体会》一文中再次指出，《新河县志》中存在有不少封建糟粕。如有浓厚的资鉴主义史观，书中一些地方指责农民起义，称捻军为匪，志中有滥收的人物。^⑩可见，傅振伦并不讳言过去修志过程中的失误，敢于承认自己以往的不足之处，反映出他勇于自我批评的学术品格。

余 论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曾有过的变革。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特别是新文化

- ① 傅振伦：《序言》，王灿炽：《王灿炽史志论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2页。
- ② 傅振伦：《中国方志界的宏伟功业——〈中国地方志集成〉序》，《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483页。
- ③ 参见傅振伦：《唐山市科学技术志·序言》，孔繁志主编：《唐山市科学技术志》，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
- ④ 傅振伦：《序言》，田恒通主编：《新河县水利志》，新河县水利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
- ⑤ 傅振伦：《大器晚成的〈榆次市志〉》，《沧桑》1997年第1期。
- ⑥ 傅振伦：《扬州市志·序言》，江苏省扬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扬州市志》，第2页。
- ⑦ 傅振伦：《序言》，邵长兴主编：《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第1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页。
- ⑧ 傅振伦：《冀县志·序言》，河北省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冀县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 ⑨ 参见傅振伦：《中国方志学》，《傅振伦方志论著选》。
- ⑩ 参见傅振伦：《我研究地方志的经过和体会》，《傅振伦方志文存》，第4页。

运动以来,西方先进思想和学术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受到西方现代学术思潮和理论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向新文化开始转型。同样,中国传统的方志学也面临着向现代方志学转型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20世纪中国学界先后出现了两次研究方志学理论的热潮。第一次是20年代至40年代,这一时期出现一批探讨方志学理论的重要论文和多部方志学理论专著。傅振伦1935年出版的《中国方志学通论》即是现代方志学的经典著作。在该书的“方志之派别”“方志之通病”“方志之发展”“《越绝书》与《华阳国志》”“章学诚之方志学”“方志之撰述”等篇章中都有不少方志批评。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和学术机构的建立,出现学术期刊这样一种新的形式。在古代中国,学者们进行方志批评主要以序跋、札记、提要等传统形式,这严重阻碍和限制学者有关方志学研究成果的传播以及交流。学术期刊的出现,为现代学者通过写学术论文的方式表达方志批评提供了一种新平台、开辟了一条新路径。这一时期的方志批评论文,如瞿兑之《读李氏〈方志学〉》^①和季崱《书评:方志学(李泰棻著)》^②皆为评论方志学名家李泰棻所撰《方志学》一书的专文;刘熹亭的《李泰棻之“阳原县志”评述》^③一文为评论李泰棻所撰民国《阳原县志》的专文。学者们在学术期刊围绕一些方志学问题展开讨论、交流和对话,推动方志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这些都是民国时期方志学领域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兴现象。傅振伦作为这一时期参与方志学理论探讨的时代弄潮儿,也在学术期刊发表了数篇方志批评专文,如《深州风土记论略》^④、《新河旧志纠谬》^⑤、《评蔚县编修县志纲目初草》^⑥等。傅振伦作为当时初出茅庐的方志学家,以新式专著和论文来进行方志批评,给当时方志批评的进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中国第一轮修志活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中国迎来了第二次方志学理论研究热潮。傅振伦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他人生中第二个研究方志学的高潮,他先后出版《中国方志学》(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版)、《中国史志论丛》(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傅振伦方志文存》(黄山书社1988年版)、《傅振伦方志论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等重要史志著作。另外,傅振伦还撰写了数百篇方志学论文,这些论著中都包含有大量方志批评内容。特别是傅振伦在《中国地方志》《山西地方志通讯》《天津史志》《浙江方志》《江苏地方志》等方志期刊上发表了不少方志批评专文,如《元明清方志评议》^⑦、《〈五台新志〉读后》^⑧、《〈通城县志〉读后》^⑨、《书〈石城县志〉后》^⑩、《〈阳城县志〉书后》^⑪、《〈安吉县志〉读后管见》^⑫、《志坛一

① 参见瞿兑之:《读李氏〈方志学〉》,《禹贡》1935年第3卷第6期。

② 参见季崱:《书评:方志学(李泰棻著)》,《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5年第4卷第2期。

③ 参见刘熹亭:《李泰棻之“阳原县志”评述》,《西北论衡》1936年第4卷第8期。

④ 参见傅振伦:《深州风土记论略》,《新河月刊》1927年5月。

⑤ 参见傅振伦:《新河旧志纠谬》,《新河月刊》1927年5月。

⑥ 参见傅振伦:《评蔚县编修县志纲目初草》,《禹贡》1935年第3卷第12期。

⑦ 参见傅振伦:《元明清方志评议》,《中国地方志通讯》1981年第4期。

⑧ 参见傅振伦:《〈五台新志〉读后》,《山西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5期。

⑨ 参见傅振伦:《〈通城县志〉读后》,《湖北方志》1986年第6期。

⑩ 参见傅振伦:《书〈石城县志〉后》,《中国地方志》1991年第1期。

⑪ 参见傅振伦:《〈阳城县志〉书后》,《沧桑》1995年第6期。

⑫ 参见傅振伦:《〈安吉县志〉读后管见》,《浙江方志》1995年第2期。

奇葩：评〈王庆坨镇志〉》^①、《新志异卉：〈文登市志〉评述》^②、《〈宿迁市志〉述评》^③等。傅振伦作为当代中国方志学界的泰山北斗，在以上这些论著中展现的方志批评为全国修志者所看重，从而为第一轮修志活动中的方志编纂提供了行动指南和给予了及时的指导。总之，傅振伦是20世纪中国方志学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在前后两次方志学理论研究热潮中，都有重要方志学著作问世，且都产生重要影响，这在20世纪的中国方志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傅振伦在这两个时期所进行的方志批评成果，对当时的新志编纂事业以及方志学的发展都起到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傅振伦晚年弟子黄燕生在《傅振伦先生的修志理论与实践》一文所说：“在中国方志史上，傅振伦先生无疑是一位对现代方志学的创立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他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对新志规制的设计，通过品鉴历代方志的优劣，总结修志要义，从而形成了一套很有特色的新方志编纂法。”^④诚哉斯言。曾星翔在《傅振伦方志思想研究》一书对傅振伦对于中国方志学的贡献总结说：“傅振伦致力于中国地方志事业已逾七十余春秋，他以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风范，虚己从人的态度，热心扶持培养新人的行动，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和无比崇敬。被誉为中国方志学界的一代宗师，傅振伦先生用自己的言行，树立了一座让人永远景仰的丰碑。”^⑤以上这些对傅振伦的评价都是恰如其分的。

综上所述，傅振伦作为中国20世纪方志批评大家，一生热衷于方志批评工作。傅振伦毕生致力于方志学研究，具有深厚的方志学理论修养。他的方志批评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特色显著，无愧为当代方志学家中进行方志批评的典范。方志批评是方志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方志学发展的内部动力。实事求是的方志批评，可以推动新志编纂事业良性发展，促进方志学健康发展。傅振伦一生都在积极开展真诚、严肃、认真、中肯的方志批评，这无疑有利于改变和端正方志批评学界素来一味吹捧、只说好不说不坏的不良学风，促使方志批评真正发挥它本来应有的作用。傅振伦的方志批评，论述公允精当，真知灼见迭出，可启发后学进一步思考。他在方志批评中体现出敢于批评名家名志、实事求是的精神、提倡经世致用、勇于自我批评等特点，可以给后人有益的启示，值得我们称赞和仿效。同时对推动中国当代方志批评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起到促进作用。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

本文责编：周全

① 参见傅振伦：《志坛一奇葩：评〈王庆坨镇志〉》，《天津史志》1996年第4期。

② 参见傅振伦：《新志异卉：〈文登市志〉评述》，《志与鉴》1997年第4期。

③ 参见傅振伦：《〈宿迁市志〉述评》，《江苏地方志》1997年第3期。

④ 黄燕生：《傅振伦先生的修志理论与实践》，《傅振伦方志论著选》附录，第561—562页。

⑤ 曾星翔：《傅振伦方志思想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5页。